

# 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容闳的「西学东渐」(下)

卢稼谷

## 五

继林则徐之后，为祖国向世界寻求知识，寻找真理作出重大贡献者，是容闳。

但他不同于林则徐，他不是清廷的大臣，他只不过是一个出身于贫苦农家而侥幸获得留学机会的普通知识分子。他既无权也无势，他既不愿替殖民主义当传教士，也不愿为外国洋行当买办，更不希冀能在腐败的清政府里当官。他唯一的愿望是：使中国的青少年都能象他一样，获得机会到外国留学，“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①</sup>。这是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即将毕业那一年所发的一个虔诚的心愿。触使他萌发这心愿的导因是清廷的腐败落后。他说：“予当修业期由，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sup>②</sup>这就反映了他关心国事、忧国伤时的爱国思想。他下决心选择“最有益于中国”的事去做。

容氏这个开拓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的志愿，决非偶尔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筹之已熟的。他说道：“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sup>③</sup>此即他后来于18年后向曾国藩献议派遣第一批留学生的蓝图。他这志愿和理想，从设计蓝图到见诸事实，其相隔时间之长，从中不难想见其艰难曲折。

他的朋友特韦契耳(Twicheil, 或译吐依出尔)牧师记述说：容氏“和同班同学卡特勒(Carol Cutler, 现在是西方储备大学校长)的几次散步长谈中，他提出和谈论了当时正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想法产生了，愿望正在形成；但要变成现实，道路却是漫长的。”<sup>④</sup>要变成现实的道路是漫长的，事实确是这样。

容氏一从耶鲁毕业就亟亟于回国，力图实现他开拓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的抱负。就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可以说，实现他这个抱负的条件是不存在的，他回到中国，连找职业都感到困难，自然更谈不上什么理想和愿望了，这抱负之于他，有点迹近于幻想。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梦想家”，他说：“一个人在奋斗的一生中，需要做一个梦想家，然后才有可能把梦想变为事实。”<sup>⑤</sup>而他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敢于把这个虔诚的意愿和梦想变为事实，做“最有益于中国”的事。最难得的是，尽管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他依然对这个开拓中国留学教育事业的计划，始终抱着坚强的决心和信心。他后来总结这条经验说：“吾人之意想，固亦有时成为事实，初不必尽属虚幻。”<sup>⑥</sup>而“予之教育计划，愿遣多数青少年子弟游学美国”，即其一。容氏终于实现了他这个愿望。

## 六

容氏之所以能够实现他的这个迹近于幻想的愿望，既属偶然而又决非偶然。

所谓偶然，是指象他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中国第一个留美归国的落拓的知识分子，居然会有机会结识权倾一时的清大臣曾国藩，从而得以实现他怀抱已久的留学教育计划。象这末难得的一个机遇，不能不说是出诸于偶然。而曾国藩一死，他的这个计划，就由于封建顽固派的破坏，遂半而废，顿时化为乌有了。

所谓决非偶然，是就派遣留学生出国此事而言，象这样的新事物，始终要出现的，即使不是容氏，也会有别的人提出这样的倡议，只不过是容氏能洞烛机先，开其先河罢了。

事态的发展是很明显的，中国既然不能闭关自守，势必就会有象林则徐那样，敢于“开眼看世界”是提倡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人；既然要“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势必就会出现象容氏那样，敢于提出派遣成批留学生出国，以培养近代化人才的倡议。这无非是个“西风东渐”，提倡新学，以图富国强兵的问题。此乃客观形势所使然，迟早是回避不了的。因此，尽管容氏这个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被破坏了，受挫于一时，但毕竟大势所趋，其后清廷终于不得不再继续派遣留学生出国，甚至如上文所述，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可见此种时代新潮，决不是昏聩的清廷顽固派所阻挡得了的。他们对派遣留学生这样一些新生事物，采取破坏和扼杀的态度，适足以反映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顽固恶劣而已。

所以我们说，容氏之得以实现其留学教育计划的愿望，既属偶然而又决非偶然，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的统一。新生事物在成长过程中碰到波折。受到摧残，也是不足为奇的。

## 七

容氏这个“西学东渐”：派遣留学生出国培养的教育计划，从他最初的设想到变为现实，相隔达十七八年之久，上距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又相隔了三十年。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清廷的顽固封建势力的黑暗统治下，中国人民要打开眼望世界的窗口，面向世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是何等曲折艰难！

林则徐奉派到广东禁烟的时候，容氏才不过是个十一二岁的穷孩子，大约正在这个时候，他从澳门南面的小岛的南屏村，过海来到澳门的马礼逊学校学习。这是个外国人办的最早的教会学校。鸦片战争后不久即迁往香港。主持校务者为耶鲁大学留业的美国牧师勃朗（Rev. S. R.

Brown）。正是这个勃朗，五年后促使他得以有机会留学美国，时年19岁。他入马礼逊学校时，年纪还小，也许对当时林则徐的禁烟运动及其爆发的鸦片战争，尚无多大认识。学校迁往香港后，他是有所感触的。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

“1840年鸦片战争起，其后结果，即以香港让于英国。马礼逊学校遂于1842年迁于香港某山之巔，……登山眺望，自东至西，港口全境毕现。即此一处，已足见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无怪外人垂涎。”<sup>⑦</sup>从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爱国情怀。及长，他也象林则徐一样，是主张禁烟、反对鸦片贸易的，这点，无疑地也是可贵的。他在自传中有这么一段记述：“予居京三月，颇欲设法禁止鸦片之输入，灭绝中国境内之莠粟。乃上条陈于政府，请其采择施行。旋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告予，谓目前殊乏办理此事之人材，故一时未能实行。于是予此计划，束之高阁者垂二十五年，直至近数年来，始见此问题于万国公会提出讨论焉。”<sup>⑧</sup>其实，所谓“缺乏办理此事之人材”只不过是个藉口，鸦片战争后，卖国投降的清政府，哪里还敢谈及禁烟呢。这里所说的“居京三月”，指的是光绪七年（1881年）的事，其时，容氏所带去的留学生已全部被撤回，作为留学生监督的他，此时也正回国销差，在京闲住，为清廷所冷落。而他竟缺乏自知之明，上条陈禁烟，尽管是出自一片爱国心，也未免失之于太天真。不难设想，当年林则徐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成效显著，尚且落得个被贬黜充军的冤屈下场，你容氏这个被撤职的留学生监督，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不过话分两头，对于派遣留学生出国这件事来说，当年容氏的条陈，确实起过作用，取得成功了的，虽说其后半途夭折，毕竟曾于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七年（1881年）这十年间，带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造就了一批人才，为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开辟了一条渠道，其功是不可没

的。

容氏同他的老师勃朗一样，毕业于耶鲁大学，但他却又不同于勃朗：他没有做传教士。他从美国游学归国以后，为了谋职业，奔波了七八年，生活的折磨和缺乏门路，使他的开拓留学教育事业计划，不得不暂搁在一边。他目击清廷的腐败而又残忍，特别是看到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七万五千余广州群众们的惨状，非常反感，“愤懑之极”，“食不下咽，寝不安枕”，“深恶满人之无状”。他“同情于太平军”，甚至“欲起为之响应”<sup>⑨</sup>。所以，他的教育计划，最初并不想仰赖于清廷，他既同情太平天国，遂有天京之行，那是在他由美归国的六年之后，他在天京访晤了在香港时所结识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了如下七项建议：

- 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
- 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的军官；
- 三、建立海军学校；
- 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
- 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
- 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 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sup>⑩</sup>

这七项建议，实质上是个资产阶级近代化建设的纲领，其中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方针和具体措施，而重心则首先在于建立各项制度和培育近代化建设的人材；当中建立各级学校。实业学校及军校是最根本的，教育占了七项中之四项，可见其居于重要地位，尽管他出“以耶稣圣经列为主课”是不恰当的，这无疑的由于受到西方学校制度的影响，在建议中，他还未正式提出派遣留学生的计划，看来是由于当时太平天国尚未取得全国政权，条件未臻成熟的原故。

这个建议，于1859年洪仁玕初到天京时向天王洪秀全所提出的开工厂、修铁路、办报馆、开放言论自由等的主张<sup>⑪</sup>。基本上是一致的，都反映了他们力图发展资本主义的共同愿望，所以容氏这个建议获得了洪仁玕的赏识和重视，洪仁玕还就此建议问容氏逐条详加讨论：“谓何者最佳，何者最要，侃侃而谈，殊中肯綮”<sup>⑫</sup>。容氏

认为，在太平天国后期诸王中以干王洪仁玕最具近代化头脑，“盖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致富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予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sup>⑬</sup>。

既然干王洪仁玕如此器重容氏，重视其建议，随之又颁给爵位，他为什么不肯留下来为太平天国效命呢？他不是愤于清廷腐败、屠杀群众，“几欲起而为之响应”吗？何况，他还当面向洪仁玕表示过：倘“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sup>⑭</sup>呢！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种议论认为：“他们（按：指以容氏为代表的“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身上。”<sup>⑮</sup>

事实的真相如何呢？

历史事实证明：容氏当时既不认识曾国藩、李鸿章，也并不想结识这些清政府的权贵，恐怕连做梦也没有想到日后会有机会见到他们；当时他只一心一意地希望能为太平天国效力，所以一见到洪仁玕能了解此“七事”的重要性。但是光洪仁玕一人是做不了主的，“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且此时清要人皆统兵于外，故必俟协议，经多数赞成，乃可实行也。”他分明知道“他的建议不可能实行，因而不肯贪恋这个授予他的四等爵位，明明白白告诉洪仁玕：“无论何时，太平军领袖诸君，苟决计实行予第一次谈判时提出之计划，则予必效奔走。无功之赏，则不敢受。”<sup>⑯</sup>这是何等光明磊落的胸襟！他何尝有“宁愿”“把希望寄托在太平天国的敌人”身上的任何打算呢？

其实，他去谒见洪仁玕的时候，已是太平天国的末期，即杨韦自相残杀、石达开被逼出走以后，而洪仁玕又并无实权，所以，他的建议不能实行，是势所必然的，决非他不愿把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反之，他倒确实没有把希望寄托腐败的清廷及其权贵——如曾国藩、李鸿章之流，尽管他对曾国藩有过错误的评价；只要看看他对太平天国革命之起因的评论就足以表明这一点。他说：“予意当时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认为“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

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sup>⑧</sup>他怎么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必将被革命推翻的腐败政府及其权贵身上呢？

或曰：他后来不是由于得到“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的支持，才得以实现其派遣留学生、开拓留学教育，事业的计划，遂其夙愿吗？

是的，从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一旦弄清其来龙去脉，经过认真分析，事物的本质就清楚了。

容氏说：“南京之行，本希望遂予夙志，素所主张之教育计划，与夫改良政治之赞助，二者有所藉手，可以为中国福也。不图此行结果，毫无所得。曩之对于太平军颇抱积极希望，庶几此新政府者能除旧布新，至是顿悟其全不足恃。以予观察所及，太平军之行为，殆无有造新中国之能力，可断言也。于是不得不变计，欲从贸易入手，以为有极巨资财，则借雄厚财力，未必不可图成。”<sup>⑨</sup>

显然，他想通过做生意赚大钱来实现他的开拓留学教育事业计划，也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尽管如岁，却可以表明，他离开南京后，并没有任何投靠“太平天国的敌人”以实现其夙愿的打算。

他是怎样同“太平天国的敌人曾国藩、李鸿章”接近，又是怎样通过曾、李实现其留学教育计划的呢？

并不是他想去“投奔”曾、李这些权贵，而是曾国藩要找他。曾国藩为什么要找他呢？不但后人以及世史家感到意外，就是曾经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的容氏自己，当年也大吃一惊。他深感怀疑：“私念此大人物者，初无需于予，急欲一见胡为？”<sup>⑩</sup>深怕被疑为“奸细”，诱之以置于法；所以“踌躇再之”，乃婉谢曾国藩之名。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曾之所以托人去找他，是要委托他出国购办机器。——这是1863年的事：上距他谒访洪仁玕之后三年，下距天京之陷落，只不过一年光景。

推荐他给曾国藩的，是张世贵（斯桂），同容氏只不过是泛泛之交。曾国藩显然并不知道容氏与洪仁玕之间的关系。于是，在曾国藩的两次

召见中，容氏得知有建立机器厂之议，就主张先办“一良好之总厂为母厂”，先购买“制造机器之机器”，为中国近代化工业打下基础，这就是当年中国最早的机器制造厂——江南制造局<sup>⑪</sup>。对容氏这样一个“接受资本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说来，为发展中国近代化工业而出国购办机器，这样的差使他乐得去做的。就这样，两年后（1865年，即同治四年）他完成了出国采购设厂的任务，被授予五品候补同知的虚衔，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译员而已。这时，太平天国败亡已经一年了，容氏于五年前所向洪仁玕提出的七项建议，显然已成了泡影，这怎能怪他不把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呢？

他当时还不是个革命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其思想觉悟不高，他只不过是同情革命，愿为大平天国效命奔走，以促进中国近代化，为祖国为人民造福。其派遣留学生计划，为祖国开拓留学教育事业，根本日的意图，也就在于此。所以决不能因为太平天国失败了，他就停步不前，放弃这个夙愿。因此，他利用曾国藩这些洋务派同他接近的机会，力图实现这个计划，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这分明是不得已的。为什么还要遭到非议呢？显然，如果容氏当年不能实现这个计划，则中国近代留学教育渠道的开辟，不知又推迟到何年何月。这种推迟，对于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近代化工农业，培育科学技术人才，显然是不利的。何况，容氏在实现这个计划的过程中，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后来甚至被中途腰斩了，这又该怎么说呢？

## 八

前面说过，容氏有机会结识权倾一时的清大臣曾国藩，使其怀抱已久留学教育计划得以兑现，乃出于偶然。连容氏本人也认为，“予初不意得此机缘。”<sup>⑫</sup>然而他同时也意识到，他“与总督（曾国藩）初无旧交，……若贸然提议予之教育计划，似嫌冒昧。”<sup>⑬</sup>所以不但见曾时不敢当面提出，就是出国采购机器归来、获授五品候补同知衔以后，也还是通过江苏巡抚丁日昌来转请曾国藩代奏的于此可见，他同曾并无深切关系，感到没有把握，与洪仁玕是不可同日而语

的。

容氏这个计划，虽已得到曾国藩的支持，上奏清廷；但却又被延搁了三年，才得获批准；待1872年（同治十一年）夏末第一批留美学生出国时，曾国藩早已上年冬去世了，继其位为李鸿章。这个李鸿章不但不那么积极支持，甚至适得其反。后来就见分晓了。

按计划，留学生定额为120人，分四批分送赴美，规定自入学至学成为15年，可是事实上仅仅执行了十年就崩了。这原属意中。为什么呢？表面上似乎是容氏与历任留学生监督陈兰彬、吴嘉善（子登）之流发生矛盾，实质上是清廷封建顽固保守派一贯反对出洋留学、反对对外开放、反对近代化的必然结果。前面已论及，昏聩的清廷顽固派对于派遣留学生这样一些新生事物，本来就采取敌视和仇视的态度，所以肆意加以扼杀破坏，是不足为奇的。现在听到吴嘉善之流奏报，说什么这些留学生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连辫子都剪掉了，将成为“美化”（Americanized）的人，变成“洋鬼子”（Foreign Devils）了，“不复是卑恭的大清顺民”了，他们自然更加冒火，清廷也就立刻下令把全体留学生撤回国，连李鸿章也“赞成其议”，“不愿为学生援手”。（据第二批留学生、在海关工作的温秉忠于1923年12月向北京税务学校学生所作的讲演。转引自钟叔河著《走向世界》，中华书局版页135）容氏的留学教育计划，至此便告吹了！这是容氏与身而见的事，他又怎敢把希望寄托在曾李身上呢？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听到这些留学生全部被撤回国，中外有识之士，莫不感到惊诧和惋惜，连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等人，也很关切，分别联名致函清政府，请收回成命。但无济于事。1881年（光绪七年），他们终于被逼归国了。

全部留学生120人，除因病、夭折，中途辍学者26人外，余94人，只有詹天佑、欧阳庸二人已从耶鲁大学毕业，尚有60人正在读大学、32人在读中学，中断学业是很可惜的。因而有少数敢于抗命，不愿立即回国。其中有容揆、梁敦彦、唐绍仪、张康仁、谭耀勋等，连詹天佑和欧阳庸也不肯回国。有的人剪了辫，甚至信了教。例如

容氏，于1880年考入了哈佛大学，清廷发现他剪了辫，就立即取消其官费。容氏则同情支持他们，暗中给他们留下一笔必需的费用，使之得以完成学业。其后这些人也都陆续回国，发展了其所长。

从这些异学生归国后的表现可以看到，他们并不象吴嘉善所奏报的那样，变成“洋鬼子”了，反之，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真诚的爱国者。就拿他们归国未久所参加甲申中法之战和甲午中日之战来说吧，其中霞佑福、邝泳钟、黄季良、杨兆楠四人在抗法战争中壮烈牺牲，陈金教、沈寿昌、黄祖莲三人在战争中壮烈牺牲，他们为祖国抗御外侮，赴义成仁，成了烈士；而容耀垣（星南）则在抗法战争中荣获五等军功赏，吴应科在抗日战争中获得清廷授予“巴图鲁”的荣誉称号，表彰了他们的战功。这无异于给吴嘉善之流以一记响亮的耳光，证明这些封建顽固派的恶意攻击，无非是力图破坏新生的留学教育事业罢了。

这些归国后的留学生，确实对祖国作出了贡献，为中国近代化事业起了促进作用，这是不容否认的。

据粗略统计，他们归国以后从事于外交洋务（包括海关）者为最多，约31人；次为海军与航业，约28人，再次为电信，约18人；铁路约16人；较少者为工矿业，约9人；医业约5人；教育约5人。

其中，詹天佑最早毕业于耶鲁大学雪菲尔学院铁路工程专业，是我国最早的铁路工程师。特别是，他曾主修京张铁路，自行勘察、设计、规划、施工，亲自经营领导、尽管工程艰巨，竟能提前完工，开了我国不假外力、自建铁路之先河，深为中外人士赞誉和景仰。从而，于清末民初，形成了以詹天佑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最早的铁路工程师队伍，包括邝景阳、卢祖华、罗国端、梁如浩、钟文耀、周传谏、黄仲良、陆锡贵等人，其中卢祖华、梁如浩、钟文耀等九人，还当过铁路局局长，梁如浩于民国初年还任过交通总长及外交总长。他们对祖国铁路事业之创建，都作过有益的贡献。

在矿业方面，则有邝荣光、吴仰曾、陈荣贵、邝贤傅、曾溥、梁普照等一批中国最早矿业

工程师，其中邝荣光对开采山西煤矿，吴仰曾对开采河北开滦煤矿，都作出过较突出的贡献。

在电信业方面，也有了朱宝奎、程大业、梁金荣、周万鹏、方伯梁、袁长坤、孙广明、吴煊荣、陶廷庸等一批中国最早的电信工程师，其中朱宝奎、程大业、梁金荣、袁长坤、陶廷庸等五人，做过电报局局长，方伯梁当过粤汉铁路电报部主任，朱宝奎还任过交通部次长。他们对祖国电信业的开拓和发展，都作出过有益的贡献，而程大业对敷设从北京到内蒙古的电报线工程所作的贡献，厥功尤伟。

海军方面，人才尤众，除上面已提到葭佑福等七位为国捐躯的烈士，以及曾荣获军功的容耀垣、吴应科外，还有容尚谦、蔡廷幹、邓士聪、苏锐钊、曹家祥、宋文别、邝国光、吴其藻、吴敬荣、徐振鹏等，其中容尚谦曾参加过中法、中日两次海战，担任过环泰舰舰长；蔡廷幹先在大沽口鱼雷艇服役，参加过甲午中日海战，后升为海军元帅，晚年著有《唐诗英韵》（Chinese

Poem in English Rhyme）等书，在英美甚为流行，对中外文化交流有所贡献。这批海军人才，有九人当过舰长，吴应科还任过舰队司令，并与吴敬荣一道，于民国初年当过总统黎元洪的顾问；而徐振鹏于清政府筹建军部时即参与了筹建工作，先后任过司长和海军部次长。他们对中国最早的海军建设，超过积极的促进作用，并且参加了抗敌御侮的卫国战争，立下了功劳。

综上所述，尽管概括得较粗略，不够全面细致，但已足以窥见，容氏所苦心开创的近代留学教育事业，是卓有成效的。他带去的留学生，名为120人，实则不足百人（94人）。归国后绝大多数都抱有爱国情怀，能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特别是在铁路、矿业、电信、海军等的科学技术方面，都是带开拓性的，他们为之含辛茹苦，奠下初基，影响是深远的。倘其留学教育计划，不是被清廷封建顽固保守势力扼杀于摇篮之中，其成就自然远不止于此。

所以容氏在其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即《西学东渐记》中说：“所幸者，首批幼童中，有二三坚忍不拔，卒成径世之才。”这使他感到聊足以自然的了。他还拳拳属望：“因其呼号援引，庶得使中国学生复能万

里来航，研讨西学。中国之强，或在兹乎！”足见他对其所开创的留学教育事业，始终是念念不忘的。果然，正当容氏言念及此的时候，适巧美国愿意退还庚子赔款一部分，作为中国学生留美费用之基金，并于1911年（宣统三年）成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主其事者为唐国安（第一任校长），正是容氏当年带往美国留学的第二批幼童，如今继他来主持培养出国留学生的校务了。从此，中国留学教育事业又兴旺起来，可见这个历史潮流毕竟是阻挡不住的。形势变了，当此留学教育事业复甦之际，顽固腐败的清王朝的丧钟也随之敲响了，这真是历史的讽刺。而领导推翻清王朝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如孙中山、黄兴等，也正好是一批怀着民族民主革命抱负的留学生。

一位教育学家舒新城在他的《中国近代留学史》一书中说了几句很中肯的话，他说：“欲述留学生之渊源，不可不先知容氏。”由此可见，容氏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事业开拓者的历史地位，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 九

容氏的留学教育计划遭到反动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他的事业受到了挫折，倒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清廷之不可恃，不能把祖国近代化的希望寄托于它，——这末一个腐败没落的封建王朝。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之后，他终于从一个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逐步走上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成为孙中山反清武装起义的积极支持者，并派儿子容观槐去担任孙中山、黄兴所委任的广东制造局（兵工厂）的总工程师兼总理。孙中山也很器重他，当孙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曾专函邀请容氏回国。函中说：“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各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1912年1月）可惜当时容氏正患中风，未能遂归国效命的意愿，同年四月，也就在美国辞世了，终年83岁。

如上所述，从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到容氏的“西学东渐”，导引我们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是一个多么艰难曲折的历程。缅怀过去，瞻望未来，对于建设我们社会主义祖国是有着深刻

# 康广仁被捕遇难之经过

关胜勋口述  
周育民整理

我今年七十五岁,出生在南海馆。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就住在我现在住的这个院子。因为院子内栽有七棵树,当时称做“七树堂”。听老一辈人说,康广仁来戊戌年来京时,也住在南海馆,在“七树堂”后面第三个院子右侧靠菜市胡同方向的一个小院里。

戊戌政变那天,康广仁、梁启超等四人正在屋里打牌,清军大队人马向南海馆扑来。邻院有个厨子看到清军,知道是来抓康氏兄弟的,赶紧跑来送信。梁启超得信,立刻起身,把自己的钱塞给厨子,匆匆离去,因而脱险。康广仁也给了厨子钱,并换上了这个厨子的衣服。但是,他临行前又犹豫不决,二返其院,于是发生了变故。清军包围了南海馆,周围的高墙上站满了清兵。康广仁的厨子(不是报信的那个厨子)为前两天康广仁因故打了他一下,正怀恨在心,看到大队清军和康广仁笃定的样子,知道清军是来抓他的,便乘机报复,向清军告发了他,康广仁因而被捕。

在康广仁被押赴菜市口刑场的那天,粤东乡亲纷纷捐钱给西鹤年堂药铺(今鹤年药店)。因为这个药铺地处菜市口(它的招牌是明代大奸相严嵩题的字),刽子手的刀具都放在这个药铺里。送钱给这个药店,可以买到“三针一杯酒”。这杯酒叫做“迷魂酒”,犯人下刑车之后,喝了这杯酒,便神志不清,可以减轻临刑时的痛苦,药铺老板还向刽子手送贿,让他在行刑时刀下留情,使犯人受刑后头断肤连,由药铺负责用三针缝合尸首,以便犯人家属将犯人全尸收殓。粤东乡亲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略表同乡之谊。康老夫人(即康广仁之妻)和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以前也常到南海馆来探望乡亲。

(1983年5月1日访谈)

注释:

南海馆即南海会馆,今北京米市胡同43号。

的现实意义的。

注释:

①③《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页13。

② 同上书页21。

④《西学东渐记·代跋》湖南人民出版附录页6。

⑤ 《西学东渐记》第七章,译文转引自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祖》页21。

⑥ 《西学东渐记》第三章页12。

⑦ 《西学东渐记》第二章页8。

⑧ 《西学东渐记》第二十章页112。

⑨ 同上书第六章页31。

⑩ 同上书页56—57。

⑪ 洪仁玕《资政新编》。

⑫⑬⑭《西学东渐记》第十章页57。

⑮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页225。

⑯ 《西学东渐记》第十章页57。

⑰ 同上书第十章页58。

⑱ 同上书第十一章页61。

⑲ 同上书第十二章页63。

⑳ 同上书第十三章页69。

㉑㉒同上书页75—76。

㉓ 同上书页70。